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百所重点研究基地
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系列学术文集

汉以前东北考古研究

朱永刚 著



科学出版社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百所重点研究基地
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系列学术文集

汉以前东北考古研究

朱永刚 著

科学出版社

北京

内 容 简 介

本书是对汉以前东北考古研究专题文集,共收入论文40篇,包括“新石器时代”“青铜时代”“燕秦汉时期”“区域考古学文化编年与谱系研究”“其他”五部分。内容涉及考古学文化和史前聚落个案研究;区域考古学文化编年、谱系、发展阶段和时空框架研究;还有对史前器具、陶器纹饰和刻划符号的解析。

本书供中国东北及东北亚地区考古与历史研究者和高校相关专业师生阅读参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汉以前东北考古研究 / 朱永刚著.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7.11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百所重点研究基地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系列学术文集)

ISBN 978-7-03-055060-6

I. ①汉… II. ①朱… III. ①新石器时代考古-东北地区-文集②考古-东北地区-青铜时代-文集③考古-东北地区-秦汉时代-文集 IV. ①K872.304-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265891 号

责任编辑: 赵 越/责任校对: 邹慧卿

责任印制: 肖 兴/封面设计: 张 放

科学出版社 出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16号

邮政编码: 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中国科学院印刷厂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7年11月第 一 版 开本: 787×1092 1/16

2017年11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 36 1/2 插页: 1

字数: 850 000

定价: 29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我社负责调换)

本书的出版得到

吉林大学

边疆考古与中国文化认同协同创新中心

资助

引言

将这本文集取名为《汉以前东北考古研究》，有这么几点考虑。一是，1982年我考入吉林大学研究生院，师从张忠培先生，张先生当时给我拟定的研究方向为“汉以前东北考古学”，在我从教的三十多年里，始终遵循先生指引的这一方向从未改变；二是，留校任教后，先后开设了“东北新石器与青铜时代考古”“汉以前东北考古区系类型研究”“东北燕秦汉考古和东北考古专题”等系列课程，在汉以前东北考古教学与实践中，始终把握学科最新发展动态、突出专业特色；三是，吉林大学地处东北，一直强调严格的田野考古训练，坚守一切认知从考古材料出发的治学理念。多年来，我主持或参加的十余次考古发掘、区域考古调查，主要集中在包括内蒙古东部在内的东北地区，在此基础上产生的系列研究成果，也都围绕这一领域展开。所以我认为这一命题既是对自己学术经历的回顾，也是研究成果的检视和总结，更是为表达吾师引领、惠泽终身、融入我内心感动的回馈。

本书收入的40篇论文是从历年发表的文章中甄选出来的，代表了我在汉以前东北考古方面的主要观点与学术体系。文集分五个部分。第一部分，新石器时代收入10篇论文。《辽东地区新石器时代含条形堆纹陶器遗存研究》一文，写于20世纪90年代。该文通过陶器类型学研究，认为辽东半岛新发现的“三堂一期文化”显然不是由小珠山下层、小珠山中层发展而来的，说明在本地区小珠山系列文化之外，还存在着另一种以条形堆纹陶器代表的遗存。这类遗存可能是由鲁西南经胶东半岛传入辽东半岛的，在继续北上过程中，除形成偏堡子类型，还影响到西北朝鲜地区。这类遗存的主要特点表现为，时间上的延续性，空间上的流动性和地域上的差异性。《大沁他拉陶器再认识》曾假定，新石器时代沿科尔沁沙地南缘，经奈曼、库伦、彰武、康平一线，存在一条沟通辽西腹地与下辽河平原的通道。《从科尔沁沙地东部考古发现看下辽河流域新石器文化的向西传布》继续重申这一观点。根据近年来的考古新发现，偏堡子类型那样的遗存还向西直抵内蒙古奈曼旗、扎鲁特旗，参与到南宝力皋吐墓地所反映的文化构成中。由此证明，我在二十多年前提出的沿科尔沁沙地南缘存在文化通道的设想是成立的。《中国东北先史环壕聚落的演变与传播》一文，是参加日本九州大学人文科学研究院合作项目而写作的。该文将辽西地区环壕聚落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探讨了其形态和结构的演变。通过与下辽河、嫩江中下游和吉林省中部、东部地区发现的环境遗址比较，从时空范畴看，东北最早的环境发生在辽西地区，然后呈序时性的由西向东延展分布。按这一线索推导，集中发现于朝鲜半岛南部和日本九州地区环境形成的聚落，深受中国东北影响，并指出这绝不仅仅是单一文化元素的传播，环境聚

落本身就蕴含着深刻的文化内涵。接下来的《论西梁遗存及相关问题》《关于南宝力皋吐墓地文化性质的几点思考》《探索内蒙古科尔沁地区史前文明的重大考古新发现——哈民忙哈遗址发掘的主要收获与学术意义》几篇论文，是对内蒙古东部地区近年来发掘的几批新材料的探讨。通过文化内涵解析和年代与性质的认定，可确认它们属于不同年代、各具特点的几种新考古学文化类型，其中科左中旗哈民忙哈遗址的发现尤为重要。哈民忙哈遗址是我国考古工作者在北纬 43° 以北地区，首次大面积发掘的史前聚落遗址，遗址埋藏条件好，出土遗物丰富，遗迹保存完整。发掘中清理出相当完整的房屋木构架遗迹和大批非正常死亡堆积的人骨，场景十分震撼，在我国新石器时代考古中极为罕见。《内蒙古哈民忙哈遗址房址内大批人骨死因蠡测——关于史前灾难事件的探索与思考》一文，根据种种迹象判定，哈民忙哈遗址是遭遇突发事件而废弃的。通过凝固历史瞬间的情境观察和人骨死亡年龄统计，结合自然环境和生业方式分析，在排除地质灾害、人为杀戮等灾难后，提出距今 5000 年前科尔沁沙地曾遭受过瘟疫肆虐，导致哈民忙哈居民群体死亡的直接原因，应缘于一场鼠疫。《文化变迁与边缘效应——西辽河流域北系区几种新石器文化的发现与研究》一文，基于 2000 年以来，我在西辽河以北地区多次考古调查和参加几处重要遗址发掘所掌握的第一手资料，也是对这一地区史前文化长期关注和思考的总结。主要观点可以表述为：在辽西新石器时代框架内，存在两个文化序列，一个是兴隆洼—赵宝沟—红山—小河沿主体文化序列；另一个是西梁—富河—哈民忙哈—南宝力皋吐非主体文化序列。由于后者只见于西辽河以北边缘地带，且有很强的自身特点，表现出与中心区域考古文化相分异的现象。在这一地区发生的一系列文化变迁，呈现渐行渐远的“离心运动”，这种情况到新石器时代晚期表现得尤为突出。本文以西辽河北系区几种文化类型为切入点，整合周边地区相关材料，探讨了考古文化变迁与边缘效应问题。在区系考古学文化研究取向方面，提出将辽西地区新石器文化解构成两个序列的双重构造模式，从理论层面为重建该地区新石器文化体系进行了有益探索。

第二部分，青铜时代收入 16 篇论文。青铜时代是我对汉以前东北考古研究着力较多的一方向，这次收入的论文几乎涉及东北重要的青铜文化和考古遗存，覆盖范围较广。最早写作的《夏家店上层文化的初步研究》，首次以文化因素分析方法对夏家店上层文化成分进行解析，在文化分期、渊源及与周邻文化关系方面的讨论均有独到见解。关于族属研究，本文对夏家店上层文化为山戎遗存的论证，修正了学术界一直以来占主导地位的东胡说观点。20 世纪 50 年代初命名的西团山文化，是东北地区最早确认的青铜文化。作为早年写作的《西团山文化墓葬分期研究》（《北方文物》1991 年 3 期）的姊妹篇《西团山文化来源探索》一文，从更广泛的视野和文化谱系角度探讨西团山文化来源问题，最先提出西团山文化与辽东山地及下辽河平原商周时期诸文化遗存存在文化谱系的渊源关系。《论高台山文化及其与辽西青铜文化的关系》，首次对高台山文化特征组合与年代进行了界定，比较分析了高台山文化与辽西地区三种青铜

的关系,借此推定辽西青铜时代不同系统考古学文化的变迁,与高台山文化向西扩展有关联。该文还以陶鬲谱系为线索,第一次提出夏家店上层文化主体源于高台山文化,这一观点为学界广为引用。嫩江下游及周邻地区是东北青铜时代一个独立的考古文化区,但田野工作长期滞后。1986年肇源白金宝遗址第三次发掘规模大、内涵丰富。我经历了从发掘、整理到编写报告的全过程。张忠培先生在《肇源白金宝——嫩江下游一处青铜时代遗址的揭示》考古报告的序中写道,“考古学者至今在肇源白金宝遗址发掘过三次,前两次发掘仅确认出该遗址只存在一层堆积即白金宝文化堆积,而第三次发掘,则从层位上辨识出白金宝遗址存在着先后叠压的四层文化堆积。这先后四层叠压的文化堆积的揭示与确认,不仅于白金宝遗址是第一次,至今于嫩江流域考古发掘工作中也是唯一的一次。”本文集收入的《松嫩平原先白金宝文化遗存的发现与研究》《论白金宝二期文化》《肇源白金宝遗址分期与各期文化层面考察》三篇文章,就是我在整理这批材料过程中,阶段性的认识或对所关心问题的阐述。其中最后一篇,是由《肇源白金宝》考古报告结语第二部分经重新命题改写而成。东北地区青铜时代,若从典型陶器空间坐落的区位来看,西部是鬲分布区,东部为壶分布区,它们在各自分布区内形成了传承有序的考古学文化系统。由于典型陶器的特质性,历来被研究者所重视。虽然较之陶鬲,陶壶的形态特征不易把握,但在辽东地区陶壶却是可串联起各类考古遗存、建立考古学文化编年序列、辨析谱系关系唯一的类型品。这便是《辽东地区双房式陶壶研究》的写作背景。该文提出三点认识:一是双房式陶壶的祖型可追溯到庙后山文化,在以后的发展进程中逐渐形成以太子河、浑河为中心,分布范围遍及辽东地区并反映时段特征的一种文化遗存;二是将双房式陶壶分为A、B两型,在辽东地区它们是出于同源陶壶谱系的两个发展序列;三是所谓“美松里”陶壶,是双房式陶壶自西周中晚期发生分野以后,向东流向西北朝鲜地区的一支。同时向北流布的另一支,对西团山文化的形成产生了深刻影响。《大、小凌河流域含曲刃短剑遗存的考古学文化及相关问题》一文,以介于辽西与辽东两大文化板块之间的大、小凌河流域为伸长点,将这一地区含曲刃短剑遗存划分为三个考古文化期。指出公元前一千纪后,曲刃短剑为代表的这类遗存以其连续性保持着文化内涵上的承继关系,并与努鲁儿虎山西侧的夏家店上层文化形成显著区别。这一时期,虽然大、小凌河流域青铜短剑墓具有多元文化成分杂糅的特点,但是来自辽东地区的文化因素表现得更为强烈。基于上述研究成果,《东北青铜文化的发展阶段与文化区系》一文,对东北青铜时代考古学文化作了全面总结,第一次在该领域建立起了比较完整的时空框架与谱系结构。此后在《东北青铜时代区系考古学文化论纲》中,又进一步对这个结构体系进行了细化与完善。将东北青铜时代划分六个考古文化区、四个发展阶段和东西两大区系与中间地带,这种分布格局比照先秦文献记载的东北诸古代民族方位,已具有了民族文化区的雏形。林沄先生对我承担的《汉以前东北考古学》国家教委“八五”社科规划项目的结项报告曾评价到,“一方面以亲自发掘的重要新资料,填补了汉以前东

北考古的多项空白,修正了旧有的认识,提出了新的文化类型和研究题目。另一方面,则以很宽广的文化视野和细密的比较研究,对本地区及邻区诸考古文化的年代序列、源流、相互影响提出了许多新见解。”“尤其可喜的是,在东北青铜时代考古文化区系类型上已构成一个新的自成一家的框架。”

我对东北和北方地区出土的青铜器一直比较关注,陆续发表过几篇文章,现在看来都不尽如人意。但它们毕竟记录了那个时间段我所思考的问题,也反映了当时的认识水平,所以也收录到文集里来。其中代表性的有两篇:一篇是《试论我国北方地区銎柄式柱脊短剑》,文中指出夏家店上层文化最具代表性的銎柄短剑,既不同于典型的“东北系”分体曲刃剑,又区别于“北方系”的联铸体直刃剑,其祖型葦首直刃剑与南西伯利亚米努辛斯克盆地所见卡拉苏克式短剑为同一系统。据此判定銎柄短剑是卡拉苏克式短剑的支流衍派,这个观点曾引起学界的关注;另一篇《中国北方的管銎斧》,通过对发现于我国北方地区管銎斧的全面梳理和分类与编年研究,就其分布的区域特点、文化性质和存续发展过程进行讨论。该文指出中国北方自夏代就已出现了接受中原夹内兵器影响的原生斧,至少到商代晚期又形成不同形制、各具地方特点的管銎斧变体。尽管不排除部分类型品受到外来因素的影响,但就文化背景和形制特点分析,中国北方地区的管銎斧是自成一系发展起来的。

第三部分,燕秦汉时期,发表过的文章不多,选了3篇。《吉林省梨树县二龙湖古城址调查及年代认识》是一篇简报,之所以选定收入进来,是因为二龙湖战国至汉初古城址的认定,颠覆了此前学界对战国时期燕文化在东北地区分布范围的认识,使其控制范围又向北推进了100余公里。这一发现对东北民族、考古、疆域研究具有重要意义。《辽宁锦西郛集屯三座古城址考古纪略及相关问题》一文,通过对郛集屯集中发现的三座城址形制、结构、建筑特点的考察与年代认识,为这一地区先秦古代部族的考定和秦汉郡县设置研究提供了重要依据。《东北燕秦汉长城与早期铁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研究的若干问题》,表述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东北燕秦汉长城是一个巨大的防御体系,更是一条特定历史时期划定的不同民族、疆域和不同文化及生存状态的分界线。从时空范畴和内容形式看,燕秦汉长城以南辽河东西两翼地区为中原文化政体覆盖范围,文化面貌与燕秦汉文化大体一致,并保持同步发展态势;长城以北及边远地区,则保持着原有文化的多样性和交错并存的复杂性。本文历数长城以北地区含早期铁器的遗址和墓葬,探讨了汉式铁器在东北的传播,针对已发现的诸考古学文化遗存,结合汉魏文献记载,提出东北早期铁器时代已形成民族文化分布的基本格局。

进入2000年以后,我和我的同事王立新教授先后承担两项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项目号:01JAZJD78003、2007JJD780122)。2002~2003年,项目组在西拉木伦河上游进行了较大范围的考古调查,并对重点遗址发掘。这次田野工作历时两年,涉及内蒙古克什克腾旗、林西县、巴林右旗三个旗县,踏查遗址40余处,识别先秦时期9种文化遗存,其中林西县井沟子西梁新石器时代遗址和井沟子青

铜时代墓葬为代表的两种文化遗存为首次发现。这项工作的意义在于，填补以往不同时段考古学文化的空白，同时也确立了该流域区先秦时期比较完整的考古学文化编年序列。2007年和2009年，“科尔沁沙地汉以前考古”课题组，对吉林省通榆县、洮南县、白城市洮北区，内蒙古科右中旗、扎鲁特旗、通辽市、开鲁县、科左中旗、奈曼旗、库伦旗等两市八旗县，进行了有针对性的田野考古调查和复查，共新发现含新石器时代遗存的遗址30余处，结合近些年在这一地区几次大规模发掘，尤其是多项重大考古发现，使考古工作一直比较薄弱的科尔沁沙地新石器时代考古取得了突破性进展。据目前掌握的材料，已初步建立起的编年序列共有9种文化遗存，可划分六个时段。本文集第四部分选入的论文，基本都同区域考古学文化编年与谱系研究有关，其中有4篇是所承担项目的阶段性成果或相关研究。

第五部分，列入其他考古学研究的有6篇文章。过去我在考古发掘和资料整理时，遇到个别既叫不出名字也不明用途的器物，还有陶器上的特殊纹饰和刻划符号等，往往会萌生出种种猜测。然而出于好奇的猜测不是根据，需要的是考古学方法，并结合历史文化印记的寻觅和民族志材料的认证，做出合乎实事的逻辑判断。也许是兴趣使然，我对这类题材比较关注，因为它们是保留下来的古代形象历史，极富情趣且内涵丰富，值得充分利用。这里收入的几篇文章，全凭个人理解，虽然难免疏漏、错误，但在探究过程中却帮助我扩大了文化视野，也算有所收获。最后一篇《中国考古学20年之发展现状与跨世纪的中国考古学》，是为吉林大学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20周年大型学术报告会撰写的讲演稿，附在后面就作为结束语吧。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集收入的40篇文章中，有30篇为我独立撰写，其余10篇系与师友、学生合作，皆由我执笔完成。

本文集编辑过程中，吕军老师和她的学生们对部分早期文稿重新进行了文字打印和图表扫描，文中大部分插图由我的学生陈醉做了修改和重绘，我妻子敖澄参加了大部分文稿的打印和校对工作，科学出版社赵越负责全书编辑，对于他们的辛勤付出表示衷心感谢！本文集出版得到吉林大学边疆考古与中国文化认同协同创新中心资助，是我要特别致谢的。

目 录

新石器时代

辽东地区新石器时代含条形堆纹陶器遗存研究	(3)
大沁他拉陶器再认识	(13)
中国东北先史环壕聚落的演变与传播	(21)
论西梁遗存及相关问题	(36)
桶榆县三处史前遗址调查与遗存分类	(49)
关于南宝力皋吐墓地文化性质的几点思考	(66)
探索内蒙古科尔沁地区史前文明的重大考古新发现——哈民忙哈遗址发掘的 主要收获与学术意义	(73)
内蒙古哈民忙哈遗址房址内大批人骨死因蠹测——关于史前灾难事件的探索 与思考	(80)
从科尔沁沙地东部考古发现看下辽河流域新石器文化的向西传布	(92)
文化变迁与边缘效应——西辽河流域北系区几种新石器文化的发现 与研究	(102)

青 铜 时 代

夏家店上层文化的初步研究	(131)
夏家店上层文化向南的分布态势与地域文化变迁	(164)
西团山文化来源探索	(179)
论高台山文化及其与辽西青铜文化的关系	(190)
大、小凌河流域含曲刃短剑遗存的考古学文化及相关问题	(209)
辽东地区双房式陶壶研究	(225)
松嫩平原先白金宝文化遗存的发现与研究	(237)
肇源白金宝遗址分期与各期文化层面考察	(250)
论白金宝二期文化	(269)
东北青铜文化的发展阶段与文化区系	(278)
东北青铜时代区系考古学文化论纲	(301)
试论我国北方地区釜柄式柱脊短剑	(322)
锦西邵集屯小荒地出土的曲刃青铜短剑与屠何故城	(336)
吉林省及相邻地区出土铜剑的聚类分析——兼论东北系铜剑的区系与流变	(344)

中国北方的管鋸斧	(356)
试论中国古代的觶	(384)

燕秦汉时期

吉林省梨树县二龙湖古城址调查及年代认识	(401)
辽宁锦西郜集屯三座古城址考古纪略及相关问题	(410)
东北燕秦汉长城与早期铁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研究的若干问题	(420)

区域考古学文化编年与谱系研究

查干木伦河流域古遗址文化类型及相关问题	(437)
西拉木伦河流域先秦时期文化遗存的序列编年与谱系	(450)
科尔沁沙地东北部地区新石器时代遗存初探	(469)
近年科尔沁沙地新石器时代考古发现与研究的新进展	(489)
吉林省青铜时代考古发现与区系研究	(499)

其 他

吉林有节石铲初论	(513)
肇源白金宝、小拉哈遗址陶器刻划符号初识	(522)
白金宝文化篦纹陶纹饰初论	(527)
燕山南北地区发现的史前石容器及相关问题	(539)
“丫”形陶器——一种未知的史前器具浅析	(550)
中国考古学 20 年之发展现状与跨世纪的中国考古学	(560)

新石器时代

辽东地区新石器时代含条形堆纹陶器 遗存研究

1956年王增新报道了在辽宁新民县下辽河以东偏堡沙岗子遗址发现的几件完整陶器，其中的一件大口深腹罐器表施有纵向排列的条形堆纹，纹饰特征十分鲜明。同时在该遗址还采集到各类刻划纹和细泥条堆纹陶片。报告者认为“陶器的式样和花纹都很少见”，“显然是易于区别而有特殊性的”^{〔1〕}，196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东北队首先在沈阳肇工街发掘到含条形堆纹陶片的文化堆积，证明这类遗存是单独存在的。20世纪70年代以后，沈阳市文物考古工作队，又先后在新民县东高台山和沈阳新乐遗址找到了确定其相对年代关系的地层依据。通过对这种遗存文化内涵的初步了解，人们一般认为它是下辽河流域新石器晚期阶段的一种考古文化，提出命名为“偏堡子类型”^{〔2〕}。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随着近年辽东地区田野考古工作的进展，在本溪沿太子河流域地区、鸭绿江右岸的丹东地区和辽东半岛南端的旅大地区，也相继发现了饰条形堆纹的陶器。由于这种特殊纹饰的陶器已具有较大分布区，所以引起了考古学界的普遍关注。

所谓“条形堆纹陶器”是指在器表纵向贴塑细泥条堆纹的陶器。因为这种泥条的宽度一般不超过0.5厘米，截面呈三角形，有的研究者又把它叫作“窄细条堆纹”或“尖突棱堆纹”^{〔3〕}。据观察条形堆纹有两种制法，一种是将细泥条等距离贴附于器表；另一种是直接器表挤压堆塑成形。纹样有直条、曲折条、波浪条，泥条表面往往切压成绳索或链条状。陶系多为羼滑石粉的红褐陶，也有灰褐或黑陶。器类有筒形罐、壶和鼓腹罐。据目前已发表的材料，含条形堆纹陶器的遗存主要见于辽河及辽东半岛地区，均属于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本文拟对这一时空范围内含条形堆纹陶器遗存的成因、文化性质及相关问题做一探讨，不当之处恳请指正。

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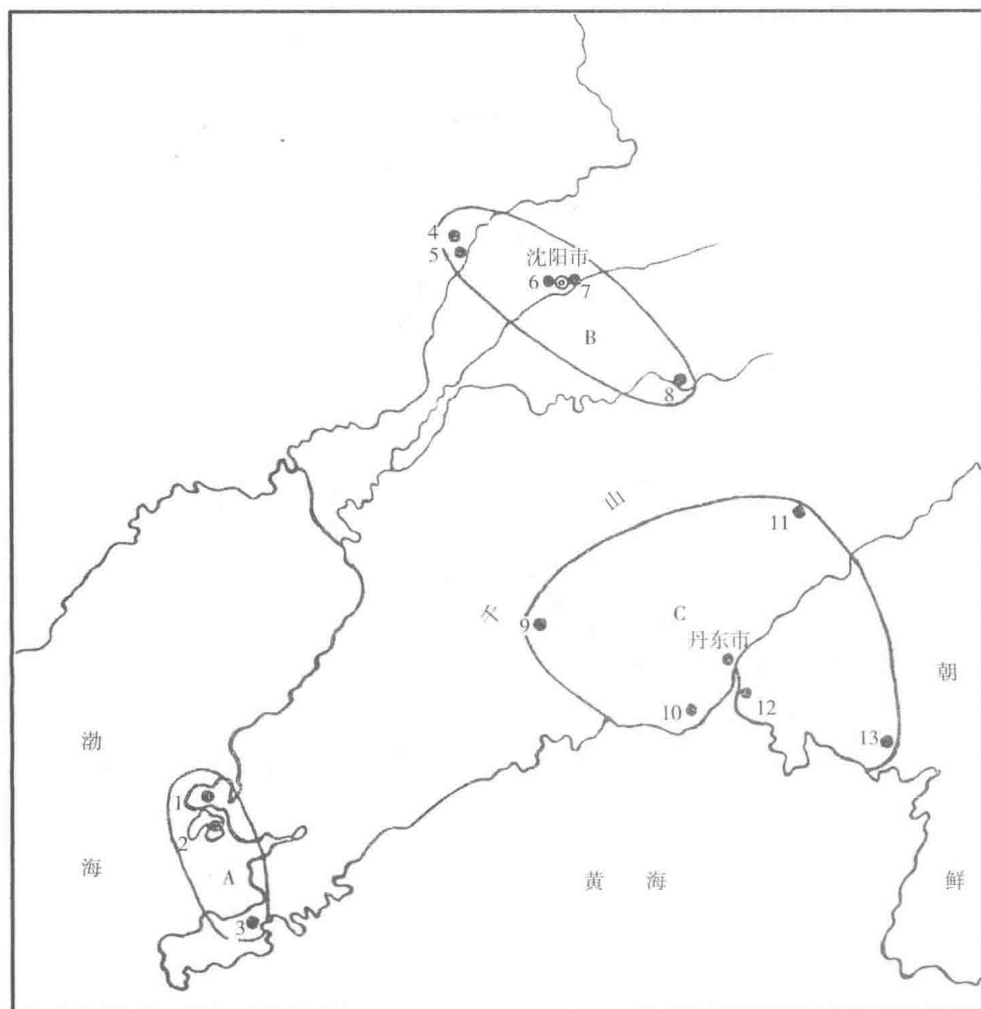
在考察了条形堆纹陶器的分布、出现率、形式特点及由这类陶器构成的器物组合之后，本文认为根据其分布地域和文化差异可划分为三个区（图一）。

1. A区

指辽东半岛南端，主要见于半岛西侧临渤海的诸岛屿上。发掘的遗址有长兴岛三

堂和交流岛蛤皮地^[4, 5]。另外在旅大近郊的文家村、郭家村也发现过条形堆纹陶器残片^[6, 7]。叠唇筒形罐是该类遗存最主要的器类, 据三堂遗址陶器统计约占 89.3%、上述遗址出土的叠唇筒形罐在器物造型和纹饰风格方面呈现出很大的一致性, 所以是这类遗存典型的代表性器物。与叠唇筒形罐共存的其他器型有壶、钵、碗、孟, 但出土数量少, 其中壶无完整器, 仅见口沿残片, 从发表的线图来看似乎很难辨识其形态。

三堂遗址的地层关系表明, 含条形堆纹陶器的一期遗存早于相当于小珠山上层文化的二期遗存。另据郭家村遗址第三、四层堆积中曾出现一些“用细泥条填充凸起”堆纹陶片的共存关系分析^[8], 这类遗存的年代大体相当于小珠山中层时期或略晚些。碳十四测定数据小珠山中层距今 6055 年 $\pm$ 315 年, 郭家村 II T6 第六层距今 5625 年 $\pm$ 125 年(均经树轮校正)^[9], 可供参考。



图一 辽东条形堆纹陶器分布示意图

1. 长兴岛三堂 2. 交流岛蛤皮地 3. 甘井子文家村 4. 新民偏堡 5. 新民东高台山
6. 沈阳新乐 7. 沈阳肇工街 8. 本溪马城子 9. 岫岩北沟 10. 东沟石佛山
11. 宽甸 12. 龙川郡双鹤里 13. 定州郡堂山

2. B 区

位于下辽河流域,以沈阳、新民为中心。已知地点有沈阳肇工街^[10]、新乐^[11]新民高台山和偏堡子^[12, 13]。另外在本溪马城子 B 洞下层、水洞下层、九洞沟龙洞下层等地点也发现了含条形堆纹直腹筒形罐陶片,发掘者指出“从器形和纹饰观察具有偏堡子文化类型的器物特点”^[14]。因此,太子河上游地段也应属于这一区域。筒形罐是 B 区的典型器物,有两种形式,一种是鼓腹叠唇筒形罐,其基本形态与 A 区同类器相似,另一种是直腹无叠唇筒形罐,为其他地区所不见。据东高台山遗址的统计,壶占出土陶器的 28%,是与筒形罐伴出的主要器类。器形为矮领、长圆腹,个别的有器耳,器表施条形堆纹或刻划的线型几何纹。

以偏堡子为代表的这类遗存的年代,可以从陶器的纹饰特点及相关遗址的地层关系两方面推定。

(1) 东高台山陶壶的正反三角复线纹和回字形复线纹、肇工街叠唇筒形罐上的梳齿纹,与丹东地区北沟和石佛山遗址出土陶器的纹饰相同,且往往施于同类陶器上,这表明它们的年代比较接近。后者的年代被认为大体相当于小珠山上层时期。

(2) 东高台山遗址含条形堆纹陶片的地层被本地区早期青铜时代的高台山文化所叠压。高台山文化最早一组碳十四年代数据距今 3960 年 $\pm$ 220 年,树轮校正年代 4355 年 $\pm$ 245 年^[15],B 区含条形堆纹陶器遗存的年代下限当不晚于此。

3. C 区

即千山东南至鸭绿江下游的丹东地区。经正式发掘的遗址有东沟县的石佛山^[16]、岫岩县的北沟^[17]。此外在丹东以北的宽甸县^[18]、西北朝鲜龙川郡的双鹤里,定州郡的堂山也先后发现条形堆纹陶片^[19]。本区陶器群以折沿罐、敛口罐和壶为典型器物,还伴出有龙山文化的磨光黑陶圈足盘、三环足盘和镂孔豆。纹饰种类繁多,以刻划为主,常见的有人字纹、平行纹、三角形、网格纹、叶脉纹、复线几何纹、梳齿纹等,据北沟遗址发掘报道,各种刻划纹约占出土陶器的一半以上。饰条形堆纹的陶器数量不多,但特征显著。与 A 区比较,器物的基本组合及刻划纹和条形堆纹在各自器物群中所占比例均有明显不同。与 B 区比较,叠唇筒形罐和矮领长圆腹壶虽是两区共出的器物,但同一类器物的出现率和形态特征有所区别。例如叠唇筒形罐是 B 区的流行器物,尤其是施条形堆纹的筒形罐出现率较高,而在 C 区仅有少量发现,施条形堆纹的筒形罐则更少见。反之 C 区出土的陶壶不仅数量多,而且形式多样,流行竖桥状耳。相比之下, B 区的陶壶则显得形式单一,器耳不发达。此外, C 区的条形堆纹折沿罐、敛口罐和打制的亚腰石锄及细石器等也为其他两区所不见。所以 C 区是与 A、B 区相区别的一个独立考古文化区。

本区含条形堆纹陶器遗存的年代相当于小珠山上层时期。北沟遗址已测定的碳十四数据距今 4390 年 $\pm$ 150 年和 4680 年 $\pm$ 100 年,大体接近实际年代。

二

以上材料表明，含条形堆纹陶器的遗存分布较广，且存在着时间差别。那么如何解释这种区域性的共同现象，条形堆纹陶器最初产生于哪个地区，又是怎样传播的呢？下面我们将进行讨论。

筒形罐是沟通辽东各区含条形堆纹陶器遗存的典型器物。这种筒形罐除一般在器表上半部施条形堆纹外，还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在器口沿外侧贴泥片形成叠唇。依据叠唇筒形罐在各遗存中的相对年代，按照其口沿叠唇的形式及腹形和纹饰的变化，经排比得到以下演变的逻辑序列。

I式：弧腹大平底。口沿外贴扁平泥片与器口尚有一定距离。三堂ⅡF3上：14，器表条形和波浪形堆纹相间等距离均匀排列。三堂ⅡT202⑤：7，器表直曲条纹之间施刻划纹，条形堆纹相对稀疏（图二，1、2）。

Ⅱ式：鼓腹小平底。口沿外贴泥片上缘与器口平齐，剖面呈三角形，东高台山80T1⑤：3，器表直曲条形堆纹相间并施有刻划纹，其纹样与三堂ⅡT202⑤：7标本相近（图二，3）。东高台山80T1⑤：20，条形堆纹变粗呈节状，排列稀疏（图二，4）。石佛山曾采集到相似纹样的标本，亦可归入此式别（图二，5）。

Ⅲ式：口沿外贴泥片下缘向外翻。肇工街出土的标本器表均饰梳齿纹，同类器不见施条形堆纹者。石佛山遗址发掘简报中施梳齿纹的筒形罐亦不同条形堆纹筒形罐共存。因此，梳齿纹是继条形堆纹之后反映叠唇筒形罐发展过程的一个独立阶段（图二，6~8）。

Ⅳ式：折腹、下腹内收成小平底。直口叠唇，唇外有锯齿花边。石佛山ⅠT4：36，素面无纹饰。根据辽东半岛黄海沿岸青铜文化素面叠唇筒形罐较发育的事实，推定此类标本为本排序的最后一段（图二，9）。

从器物形态学的角度观察，这一逻辑序列的演变为，口部叠唇由口沿外贴泥片上缘与口沿有一定距离逐渐发展到外贴泥片上缘与口沿平齐连成一体；口沿外贴泥片下缘经分离与器壁形成一定空隙到逐渐外撇向上翻，最后与口沿相平行；器形由弧腹大平底至鼓腹再到折腹小平底；纹饰由条形堆纹的细条密集排列到节状粗条稀疏分布，由取代条形堆纹的梳齿纹再到素面无纹饰。

检视各式别坐落位置可以看出，I式分布于A区，Ⅱ式、Ⅲ式分布于B、C区，Ⅳ式仅见于C区。由此判断A区的叠唇筒形罐要比其他区的同类器早一个阶段。I式筒形罐存在的A区文化内涵较单纯，反映的区域性特征最为明显，是迄今辽东地区出条形堆纹陶器最早的区域。B区的叠唇筒形罐出现时间要晚于A区，条形堆纹陶器在这类遗存中是主要文化成分之一。C区的叠唇筒形罐发现较少，在筒形罐上施条形堆纹的做法有退化现象。通过以上分析可以推定，辽东地区的条形堆纹陶器有一个自南